

# 中国观

2016年第4期 总第58期

# CHINA WATCH

中国智库 建言发展 Policy Advice



复旦发展研究院  
FUD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  
Centre for Think-tanks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in Shanghai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 目 录 | CONTENTS

- 01 从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看中国的供给侧改革策略  
/ 程大中
- 04 地方迟滞的国企混改会不会阻碍全局的供给侧结构调整? / 谢富生
- 08 供给侧改革关键是建立人力资本自由流动战略  
/ 许洁、程名望
- 10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需注意的现象  
/ 张晏
- 12 关于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建议 / 王文春
- 15 解决医患矛盾关键在于供给侧改革 / 李婷
- 18 深度开发人工智能 须政商双方合力 / 刘嘉
- 21 应打破对机器人的消极偏见 / 徐英瑾
- 23 人工智能大有可为 人类是最终掌控者 / 张文强
- 25 中俄正处深化和发展合作的关键时期 / 冯绍雷
- 28 “一带一路”中极端宗教主义渗透风险及其对策  
/ 邱文平
- 31 打造“国共论坛”2.0版本 / 段哲哲

## 编辑部 Editorial Department

责任编辑	Responsible Editor
张 怡	Zhang Yi
沈国麟	Shen Guolin
黄 昊	Huang Hao
执行编辑	Executive Editor
夏 梦	Xia Meng
栏目编辑	Column Editor
付 宇	Fu Yu
周光俊	Zhou Guangjun
刊物设计	Art Editor
范佳秋	Fan Jiaqiu

## 中国观 CHINA WATCH

主办 | 复旦发展研究院 FDDI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  
CENTREMS  
地址 | 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7楼  
中国上海市邯郸路220号  
The 7th Floor, East Main Building,  
Guanghua Towers, Fudan University,  
220, Handan Road, Shanghai, China  
邮箱 | [thinktank@fudan.edu.cn](mailto:thinktank@fudan.edu.cn)  
电话 | 021-65645596  
021-55665501  
鸣谢 | 上海钰翔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从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看中国的供给侧改革策略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程大中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国际分工格局出现重大转型,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分工模式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新常态。全球价值链是摆在我们面前活生生的全球供给侧,这其中也包括我们自己的国内供给侧。因此,客观把握全球供给侧的趋势特征特别是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特征,有助于廓清中国国内供给侧改革的基本方向与策略。

## 一、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态势与特点

### 1、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微观基础。

目前,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或/和非股权模式如外包等途径将其不同的生产阶段布局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从而极大地利用资源禀赋、政策法规、制度环境等方面的跨国差异而产生的商业机会。这样,一种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往往由多个经济体的多家企业协同完成,其不同生产环节及其增加值是在不同经济体实现的。

### 2、北美、欧洲(主要是西欧)、东亚和澳新地区是主导目前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三大核心区域。

世界其他地区都是围绕着这三大区域从事相应的生产、贸易和投资活动。目前,美国、德国、日本分别是这三大核心区域里的分工主导性国家,其他经济体则围绕着这三大核心国家进行分工布局。这三大区域之间有着较为清晰的分工,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分工和贸易区主要是“创新”引领,以德国为主导的欧洲分工和贸易区以及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与澳新分工和贸易区则主要是以“制造”见长。

### 3、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具有非常巧合的一致性。

北美自贸区(NAFTA)、欧盟(EU)是两个比较成功的区域一体化安排,它们正好覆盖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两个核心区。为了联结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三大核心区域,美国、日本及欧盟核心成员等关键经济体设法构建跨区域的制度性安排,这就是TPP和TTIP。如果把TPP、TTIP和NAFTA加起来的话,那么我们会看到一个庞大的、由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主导的自由贸易区集团,这很有可能演化为一个新的多边体制。可以预期的是,全球价值链分工正在重新塑造世界经济的新格局、催生国际经贸领域的新规则和新体制。

### 4、实际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的经济体越有可能成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意义上的“朋友”而不是“敌人”。

一方面,中国仍然是一个“双低”国家(即较低人均收入水平、处于

## 导读 >>

中央政府早已强调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性。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于一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所以中国应该大力加强供给侧改革,在国际价值链分工中取得有利地位。

全球价值链的较低端位置)；另一方面，无论是在总体还是在行业水平上，中国都倾向于从较高收入水平经济体进口较多的增加值，也倾向于向较高收入水平经济体出口较多的增加值。

### 5、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在不断加深、甚至高于美国的水平。

中国以外国增加值比重衡量与世界的关联程度趋于上升，且高于以进口中间品比重衡量的程度。中国与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德国的关联程度较高；但从趋势看，中国与美国、德国的关联程度在上升，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关联程度在下降。中国大多数行业基于产出和投入的价值链关联指数均超过 1.5，甚至高于美国；关联指数上升的行业远多于下降的行业。

## 二、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属于全球供给侧，是中国面临的既定背景。攀升全球价值链、推进国内供给侧转型升级，从而使中国经济迈上中高端水平，应该成为目前中国制定供给侧改革方略的目标。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 1、在供给侧改革方略中把全球价值链因素纳入其中，构建以全球价值链为导向的战略。

全球价值链分工带来的新机遇能否转化为参与者实际得到的好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者的战略与政策。长期以来，美国就一直密切关注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及其安全问题。美国国土安全部早在 2007 年曾专门发布《增强国际供应链安全战略》；2008 年又提出“国家网络安全综合计划”即要建立全方位的方法来实施全球供应链风险管理；2012 年美国白宫发布《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并于 2013 年出台《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实施更新版》；2014 年又发布《提高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框架》。美国的战略意向特别值得关注，中国需要抓紧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 2、中国应该尽快与国际社会一道建立并改进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统计方法与统计体系。

现实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已经对传统的统计方法与统计体系提出挑战。例如，传统的海关总值贸易统计大大高估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如果以增加值贸易衡量，则这一顺差额要低大约 25%。还比如，如果采用全球价值链方法测算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有效汇率，其结果约为 6.8 左右，以此衡量，人民币有进一步贬值的可能。再比如，分别基于增加值贸易与总值贸易计算的中国产业或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RCA）指数会有很大不同。这些都表明，尽快建立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统计方法与统计体系，不仅有助于准确测算中国国内供给侧的现况，而且能够新评估现有涉及供给侧改革的产业政策、汇率政策、自贸区战略以及贸易与投资政策等。

### 3、中国应该通过自身禀赋结构与制度结构的不断升级来有效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决定一国能否顺利而成功地攀升全球价值链、推进国内供给侧转型升

级的终极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禀赋结构与制度结构。首先，有什么样的禀赋结构，就有什么样的分工地位与供给侧。中国要通过发展教育与科技，有效提升禀赋结构，为攀升全球价值链、推进供给侧转型升级奠定人力资本基础。其次，全球价值链演进是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的结果。劳动分工可以提高生产力，因而可以减少稀缺程度，但却可能增加交易成本。旨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专业化效率的经济组织与制度结构就是好的经济组织与制度结构。有了好的经济组织与制度结构，禀赋结构才能得到有效升级。

#### **4、中国需要特别关注自身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发展，为成功攀升全球价值链和推进国内供给侧转型升级奠定坚实的微观基础。**

目前的世界分工格局与态势是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客观反映和结果，而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演进则是市场与企业选择的结果。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是各种优势的集大成者和最终实现者，是一国攀升全球价值链的主体。数据表明，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的世界级跨国公司不仅偏少而且国际化水平偏低，这与中国快速发展的进程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极不相称，同时也不利于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和推进国内供给侧转型升级。

#### **5、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管理和全球价值链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

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客观事实，对中国来说，关键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而是如何有效地参与这一分工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提升自身的国际分工地位。中国需要特别加强与“双高”国家（即较高人均收入水平、处于全球价值链的较高端位置）在全球价值链管理和全球价值链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这一合作应该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领域的国际合作同样重要。营造全球价值链友好型的国际环境将最终造福于有关各方，也同样有助于中国推动国内供给侧的改革、促进国内供给侧转型升级。

# 地方迟滞的国企混改 会不会阻碍全局的供给侧结构调整？

上海财经大学 金煜、谢富生

所有制是事关国家如何发展经济的一个核心问题。在 1997 年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混合所有制”的概念，中国的经济发展改变了“唯计划论”思路。时隔 16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积极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国企混改再次成为经济发展讨论的热点，社会各界对混合所有制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出发，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虽然各地方的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除了出台《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国企混改的实施细则却迟迟不见踪影，各地方的国企混改政策无法落实。之前，各界对中石化销售公司“混改”的争议，恰恰说明所有制改革的迟滞，阻碍供给侧的结构调整。本文从经济理论——“垄断”的角度，讨论国企混改，希望厘清当前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思路。

## 一、混合所有制的经济思想史

为了更好地评述国企混改，有必要简单回顾经济发展思想的两个阶段。在 1940 至 1960 年代，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经济，曾有过强调计划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观点。经济发展的计划基础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如果政府不对国民经济计划化，就不能使得资源得到有效配置，所以经济发展不能寄希望于私人部门的自发活动，而要依靠国有部门的计划安排。理论上，国民经济计划化可以通过构建结构模型，确定数量指标，使用量化的政策工具实现。基于这种理论，中国在建国初，各个地区推行单一的计划经济，强调政府对生产的全面控制。但是事实证明，由于强调政府的计划主体角色，削弱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垄断的国有部门失去了生产的激励机制，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

到了 1960 年代，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计划化的结果，是经济中遭遇种种困难。经济学家不得不对过去的理论和政策重新评估，并做出重大修正和转变，出现了“新古典主义复兴”。理论界批评经济发展的单一计划化，重估接收市场激励的私人部门的作用。受到这股“新古典主义复兴”的影响，1984 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朱镕基出任副总理后，毅然决然地打破各地国企的“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拉开了国企改革大幕。1998 至 2000 年的国企三年改革攻坚，全国各地数千万的国企职工下岗、分流、买断，大批国企破产、改制、重组。由此可见，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国企改革从来不是静

## 导读 >>

新形势下的中国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经济改革和转型，其中，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被再次强调。当前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的调整与国企混改密切相关，现阶段可以就尝试消除国企垄断做深入研究。本文将从经济理论——“垄断”的角度对两者的关系及发展进行相关探讨。

悄悄的。大刀阔斧的国企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各地的国企从改革前的普遍亏损，转变为盈利，但由于大量私人企业的只被允许进入下游产业，不少垄断地方公共资源的国企成为超级利润企业。

## 二、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何必须进行消除垄断的国企混改？

从国企垄断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角度看，研究发现：第一、在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比较中，具有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效率最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最低，私人企业的效率则显著较高；第二、在所有制存在多种产权结构安排的产业中，垄断行业国有产权结构变量对于产业绩效具有明显的负效应。从代理成本视角看，也得到类似结果：有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高昂，是不同所有制中是最高的。已有文献也发现，具有金融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不仅本身效率低下，而且由于软预算约束，占用地方财政支出，延误了各地私人企业的发展进度，这会对供给侧结构改革构成拖累。

对供给侧结构改革形成限制的还来自垄断的国有金融部门，表现在两个相互关联的特征：第一、金融结构改革受抑制，总体来讲，垄断的金融部门，其服务供给表现出非常强烈的“金融压抑”形态，这不仅表现在利率长期低于市场利率，而且表现在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和门槛准入方面；第二、作为经济增长推动力的私人经济，在金融信贷方面面临垄断的国有金融部门的种种歧视。研究发现，虽然非国有部门对中国 GDP 的贡献超过了 70%，但是它在过去十几年里获得的银行正式贷款却不到 20%，其余的 80% 以上的银行贷款都流向了国有部门。

可见，国有企业生产力低，却因为垄断而拥有过剩的金融资源，私人企业生产力高，但由于受到垄断的国有金融部门的歧视，得不到发展的金融资源。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供给侧改革是在各地国有企业垄断、金融部门抑制条件下进行的，无法避免产生资源错配，不能达到资源的优化组合和有效配置，容易导致闲置的资源浪费在无效的供给上，导致生产效率低下。

资源配置只有在符合竞争的市场规律下，才会变得更合理、更有效，生产效率才会不断上升。各地的国企混改应该强调以协同的形式来优化国有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建立公平的竞争市场。改革将私人部门具有的低成本运营，以及轻资产、重市场的管理方式，与国有部门具有的资金优势组合，协调和厘清政府与市场相互关系，只在一些核心产业强化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通过混合所有制，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效率优势，挖掘市场经济的激励潜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切实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 三、国企混改的两难困境

当代经济理论为国企混改指出了完善企业治理的基本道路。但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各地的国企混改来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企业

治理的目标在两个重要方面：第一、要给有经验的经营者的充分的自由去运营企业，缺乏市场经验的所有者不宜对企业运营作过多的干预；第二、要保证经营者以所有者的利益为目标，合理运用所有者赋予的自由去运营企业，即企业经营者能够受到有效的监督和约束。随着国企混改的推进，以垄断部门的经营者的企业内人控制权力加强，同时，各地政府部门以“婆婆加老板”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干预，不仅没有解决企业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反而出现严重地以内部人控制权力换取对政府公共资源的垄断。结果是，垄断的国企经营者不属市场运营，所有者不懂企业监管，政企难分，有能力的企业家没有动力趟这团浑水，有效的私人资本也没有机会为核心部门的效率提高做贡献。

这种尴尬的局面，反映了国企混改复杂的两难选择：第一、给企业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是必要的，可以带来企业效率的提高，但各地政府部门往往宁可容忍没有市场经验的“自己人”无作为的垄断，也不愿意承担雇佣有市场经验的“外部企业家”创新运作带来的风险；第二、国家作为所有人对企业进行监督和控制是必要的，但各地政府官员自以为是，不遵循市场规律，以行政代替市场，又使这种监督和控制阻碍了有经验的企业家参与运作的积极性。

#### 四、现阶段怎样试验国企混改？

由于观点上的争执不休，现阶段国企混改只能是试验性质的，大致有以下三种尝试消除国企垄断：第一、各个地区对于发展相对成熟，非公资本已经成长起来，并具备较强市场竞争能力的产业领域，可以允许更多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结合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第二、各个地区的新兴产业领域，以及国有经济部门控制力在进一步增强的产业领域，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第三、各个地区已经具有混和所有制形式，对人力资本贡献依赖度大，且人力资本贡献相对好评价和衡量的企业，试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对企业核心员工的市场导向的激励机制。

当前对“产权”和“产业”开放意见不一。改革派的产权开放目标是“国民外内四线联动”，实现国资、民资、内资与外资互融。产业开放目标是破除国企垄断。但是这两者都受到既得利益者的阻碍，也许，改革试验的突破口是企业的资本化，即从国企的管理模式转向国有资产资本化的管理模式，通过金融部门推出资产证券化，推进国企混改。要促使国有资产资本化的管理，首先是由各地政府控制的“国有”转向股份制，形成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利用企业在制度上的特点放宽两个自由度：第一、促使国有资本在产业中具有更大的流动性；第二、保障企业自主经营，做大做优做强。不以行政的力量改变单个企业的业务结构，而是通过金融市场，使得国有资本布局动态优化，达到国有经济在供给侧的结构调整。国有资本投向的改变和布局调整应以降低国有企业垄断，提高国有资本运行效率

为目标，发挥资本的作用，体现价值为导向。

## 五、加强国企混改的经济学研究的建议

在大力提倡“改革政策要实”的今天，面对国企混改这个长期未解的经济发展根本难题，我们呼吁各个地区，根据本地特征加强国企混改的经济学基础研究。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混合所有制的适用范围没有清晰的界定及评价。对何种国有企业适宜发展混合所有制，研究需做出范围的清晰界定，并给出各个地区界定的评价体系。其次，是混合所有制的机制设计问题。过去的研究把混合所有制理解为单纯的股权结构调整，而基本不涉及企业治理机制的配套改革，这是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成功的重要原因。再次，结合机制设计，经济学家要回答如何建立符合各个地区发展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最后，经济学家要实证研究企业的股权性质、结构与市场效率的关系，为供给侧结构调整提供企业所有制方面的支持。

也许达成经济思想的共识，可以为落实国企混改扫除争执与障碍，保障以市场为基础的供给侧改革的顺利进行。

# 供给侧改革关键是建立人力资本自由流动战略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许洁、程名望

## 一、供给侧改革的前提：尊重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的内在规律。

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升级，城乡居民已经从生存型消费向服务性消费过度，居民对消费结构和消费品的质量提出新的要求。如果消费供给不能满足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转型需求，消费的活力就无法释放。

产业升级、消费升级有其内在的规律，供给侧的改革要尊重这一升级规律。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基础仍然是制造业，互联网带来的新思维和新方法融入制造业，将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又要培育和发展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提升产业整体的素质和发展水平，促进多层次、多领域的服务业的发展，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型服务业并重，现代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并举。

## 二、供给侧改革的保障：推动政府公共财政和服务转型，激活企业创新活力。

（一）推动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大幅度提高政府公共预算中的公共服务的支出比重。公共产品的供给结构受发展阶段的制约，当人均 GDP 突破 3000 美元，政府的财政支出应向环境保护、教育、医疗、公共住房、养老等公共服务支出倾斜。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基础设施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较大，挤出了用于公共服务的财政预算，导致政府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不足，迫使居民出于预防性需要而不断增加储蓄，这种局面亟待改变。

（二）切实分开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责任和生产责任。政府环境保护、教育、医疗、公共住房和养老等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具有提供的责任和义务，但是这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主体既可以是公共部门也可以是私营部门或是社会组织。所以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方面，要打破由公共部门作为单一的生产供给方的格局，允许各种资本进入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生产领域，实现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提供过程中公与公、公与私以及私与私部门的竞争。

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责任方则通过市场机制向各生产主体采购公共产品和服务履行政府的职能，从而提高公共产品的生产效率，提高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果。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供给侧的战略调整后，预计未来几年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会遇到困难，所以在政府实现其职能的过程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培育社会组织，采用政府服务外包、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等方式，可以缓解政府面临的财政困难。

（三）理清与企业、社会界面关系，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 导读 >>

笔者认为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建立人力资本自由流动战略。需要尊重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的内在规律，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注重企业人力资本的培养和培训，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首先，地方政府应该真正割断与本地企业的输血关系。一些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核的需要或者是社会稳定的需要，往往对那些已经没有盈利能力的僵尸企业输血、补贴，导致这些企业僵而不死，产能过剩、产品积压。

其次，政府在企业的产生和发展中要创造各种条件，为新创企业提供宽松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使各类企业愿意创新，愿意升级，激发各类企业家和个体的创新活力。一方面政府需要降低税收，取消和放松各类管制，让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成为市场的主角。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建立创投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天使基金、大学生创业基金等各类基金助力形成新市场的主体和行业。

再次，要特别注重社会企业的发展。社会企业一方面承担公共服务的功能，另一方面它又有一定的资金收入，在维持机构日常运行外，其资金收入的盈余部分不是用来分红，而是进一步投入公共服务。这将会使社会企业更多更快地发展，也将大大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 三、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建立人力资本自由流动战略。

结构的调整，企业的新生和升级，人力资本是第一重要的。因此供给侧改革应把建立人力资本自由流动战略作为主要抓手。

（一）注重新兴企业人力资本的培养与企业倒闭后的人力资本再培训。供给侧的改革，必然会面临一些新兴企业的诞生，另一些企业倒闭。相关部门应加强市场所需人才的规划、培养与培训，满足新兴企业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和解决下岗劳动力的培训与再就业问题。

（二）有计划地安排低技能人才进入，实现城市发展中劳动力级配良好状态。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存在技能的互补性，具有相互依存性。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高技能劳动者是城市发展的引擎，高技能劳动者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在带动城市发展的同时，又会带动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世界范围内人口经济活动逐渐高度集中于大城市和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周围，正是得益于高技能劳动者集聚通过人力资本的外部性、高低技能劳动者的技能互补性和消费外部性，共同作用于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从而形成高低技能劳动者共同在大城市集聚。

（三）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城市低技能劳动力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待遇。在高低技能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短期无法缩小情况下，实现城市移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降低预防性的储蓄，缩小由于收入差距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此外，公共服务均等化能降低低技能劳动力的储蓄意愿，增强他们的消费意愿，从而激发社会整体消费力的提高。

#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需注意的现象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张晏

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把握好“加法”和“减法”、当前和长远、力度和节奏、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当前地方政府在推进和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需要引起注意的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现总结和分析如下。

## 一、“减法”不彻底

部分省市在去产能、清理僵尸企业的过程中，提出对国有僵尸企业“不到万不得已不搞破产清算”。用兼并重组、产权股权交易等方式推动去产能，的确能够缓解大规模失业带来的社会矛盾、减少国有资产流失，但要切忌为了规避当前的短期矛盾而忽视效率原则、加剧长期遗留问题和潜在经济风险。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需要首先明确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优势，明晰在全国一盘棋中地方问题所处的位置，对于不属于地方优势产业和重点发展产业、全国（省）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的企业，应该坚决破产清算，同时协助做好职工安置工作和再培训、再就业工程，以更好的社会保障服务做好职工的避风港、而不是变相为企业搭建新的避风港。

地方在推动供给侧的“减法”改革时，要切实吸取1990年代日本处理僵尸企业的经验教训。理论和实证文献都表明，剥离不良资产、清算和破产的不彻底是影响日本企业创新、新企业进入和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只有企业真正减负前行、行业真正化解产能，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才有可能。

## 二、“加法”不到位

在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已经涌现出很多“加法”，近日五部门联合发文推出了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相关改革加入提速期。要引起重视的是，相关配套措施需要尽快跟进，防止因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成本过高、风险较大而影响试点进程。在部分欠发达地区，土地经营权的价值评估缺乏参照系，可能出现有市无价或价无市的现象，银行的权益难以变现，权益追索存在困难。从贷款使用途径上来看，优先考虑的农业生产经营存在易受气候、周期因素影响的特点，贷款风险相对较高。地方政府尤其是欠发达试点地区的政府应一方面加快风险补偿基金的建设，提高金融机构创新支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积极拓展农业衍生品和互联网农业的渠道，引导配合提高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项目的成功率。

在简政、放权等“减法”的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需要做好监管

## 导读 >>

目前，中国正在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然而，在此过程中仍然出现了种种不可避免的问题，需要中央与地方政府妥善运用好“加法”和“减法”。

的“加法”。目前，在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环境保护等领域，需要结合供给侧结构改革做更多“加法”，一方面地方相关部门要从严执行各项安全条例和法规，不能以稳增长为借口忽视安全环保标准；另一方面中央有关部门应适时提高产品质量标准，或增加产品质量分级管理，不能再为保护企业而设立或保持低标准，以切实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推力、为供给侧改革在中高端优质产品上的“加法”提供机制保障。

### 三、“加”、“减”法配合欠规范

目前三、四线及以下城市房地产市场去库存存在较大压力，采取让农民进城购买、让房地产开发商降价、让投资者购买出租等优惠政策，以及政府购买商品房作为安置房和保障房等“加”、“减”法组合拳，一定程度上会起到作用。但是实施过程中，存在房地产开发商降价幅度不足、损害农民利益的问题。相对而言，房地产开发商一般拥有更多的资源和人脉，在去库存中更容易与地方官员和评估机构沟通，进城购房的农民和其他普通消费者相对处于弱势地位。个别乡镇继续推进的旧城改造项目中，存在低估拆迁房屋价值、高估安置房屋价值、缩小拆迁方案选择权等变相强制为开发商去库存的问题，可能存在村民因拆迁致贫的社会隐患。

从长远来看，房地产去库存的“加”、“减”法配合一方面需要政府积极推动，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保持中立、减少寻租和设租空间。只有开发商认清经济现实，合理让利，房地产市场才可能真正出清。而保护好农民等购买者的当期利益和消费者剩余，将更有利于长远的市场回暖和经济社会稳定。

# 关于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建议

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 王文春

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李克强总理17日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再次强调，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

## 一、推进供给侧改革重要性

### （一）解决“供需错位”，推动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维持了相当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居民收入的逐年增加，使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产阶级人口比重的逐年提高，意味着对消费水平的要求逐步提高。这里，消费水平提高不仅仅对消费数量的需求提高，更多的是对消费质量的标准提高。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无论企业和政府更多追求产品产值的增加，忽略了产品质量的提升。由此，造成当前社会产品供给与居民消费需求存在不匹配的现象。这种不匹配更多体现在产品质量上面。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强劲，但是国内企业无法满足居民对产品质量和差异化的需求，从而造成产品供给和需求之间的错位，即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因此，通过推动供给侧改革，解决“供需错位”问题可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

### （二）提高企业技术水平，推动产业升级。

尽管当前，我国服务业比重已经超过制造业，但是制造业仍然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确实制造业强国的理念和政策导向，推动制造业由粗放式增长向精细化生产，提高产品附加值比重，向产业链高端提升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我国企业研发投入不足，创新水平不高是各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现在，如果想通过供给侧改革，打破这一均衡，提高企业创新水平，只改革某一方面的因素或几个方面因素是行不通的。因此，供给侧改革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涉及到企业、政府、居民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 二、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建议

（一）实行差异化的减税政策，引领资源流向高效率企业。相关研究表明，自2009年起，我国宏观税负水平便进入高收入国家。2014年，全口径计算的宏观税负高达37%。在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减税收有助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高企业投资回报。但是，为了更好的推动供给侧改革，不能对所有企业实行一刀切的减税政策。税收制度必须起到引领资源向效率企业流动的作用。首先，对增强自主创新的创新投资实行减税。就激励企业

## 导读 >>

如何维持经济在“新常态”下健康稳定的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对此，在宏观调控方面，中央经济决策机构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新的改革思路。而供给侧改革也成为我国经济改革领域的热点问题。

自主创新与技术进步而言，降低企业边际税率可以降低企业研发投入成本，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投入。其次，对小微企业实行减税政策。小微企业在吸收就业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科技型小微企业更是引领科技创造需求的先锋部队。当前，我国对销售额低于 30 万元的小微企业实行 20% 的税率优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小微企业的生存压力，但仍有进一步放宽的空间，使更多小微企业享受优惠政策。虽然，提高起征点造成财政收入短期内下滑，但是长期来看，加速了小微企业成长，起到培养税基的作用。

**（二）缩减政府开支，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共担机制。**里根时期的美国是“供给经济学”成功的典型案例，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减少政府干预，缩减政府开支。个人所得税率的下调，提高了可支配收入，增加了劳动供给。企业所得税下调，增加了企业投资回报，提高了企业投资意愿。减税造成了政府税收的减少，要求政府减少支出。降低政府的财政风险。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财政缺口较大，风险较高。实施减税政策必然加剧地方政府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风险，避免地方政府破产，引起社会不稳定。

**（三）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扶持小微企业和服务业。**僵尸企业及落后产能的企业占用了大量的生产资源，但资源使用没有效率。其中，最大的阻力是地方政府不愿意让这些企业破产，短期内这些企业的存在为本地创造了产值和就业岗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中央政府转变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标准，改变以往以 GDP 为亲的考核方式。处理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伴随的很可能是工人失业。通过扶持小微企业，发展服务业，增加就业岗位。小微企业、服务业是吸收劳动力的主力军。根据统计局数据测算，第三产业每增长 1% 大约能创造 100 多万就业岗位，是工业的 2 倍。因此未来，小微企业和服务业将成为就业容纳器。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加速城镇化建设，使劳动力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劳动力作为重要的生产投入要素，是供给侧改革的重中之重。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使得劳动力在不同区域间自由流动，最终流向最有效率的地区和生产部门。同时，城镇化建设也会创造需求，有利于消化落后产能。

**（四）加速发展资本市场，多样化创新型企业融资渠道，降低创新型企业融资成本。**研发创新、企业创业均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一直以来，融资成本是企业创新和企业家创业的重要因素。和实物类投资相比，企业研发项目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更加严重，这进一步恶化了企业的对外融资能力。研发项目的复杂性和异质性使外人很难判断其潜在价值。此外，由于担心研发的初期成果被模仿而失去先发优势，企业一般不愿向投资者披露详细的研发信息。除了信息不对称，研发活动的结果（如专利、商业秘密等无形资产）很难用做贷款抵押，意味着研发项目的外部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通过发展资本市场，降低资本市场准入制度，拓宽创新创业型企业的融资渠道，有利于降低其融资成本。

**（五）推行供给侧改革同时不能放弃“三驾马车”的需求侧管理。**供

供给侧改革对经济结构和经济质量的影响并非一蹴而就，其效果可能在一个较长时期才能显现。这与研发创新的规律密切相关。产品的创新，技术的提升需要的是知识积累。因此，无论是“中国制造 2025”还是“工业 4.0”，其对经济增长的效果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在其效果显现之前，不能放弃对需求侧的管理，以保证我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平稳过渡。

# 解决医患矛盾关键在于供给侧改革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李婷

## 一、医患矛盾的制度原因

医患矛盾一方面是由于医疗服务业本身的特点，更重要的是由于医疗市场各种制度问题导致的“看病贵，看病难”，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 （一）价格平衡供求的机制消失

“看病难”可以归结为医疗市场价格机制失灵导致的供需不平衡。从需求的角度来说，随着收入的提高和医保的健全，老百姓对医疗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更高的需求，在医疗服务价格无差异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病人选择了三甲医院。从供给的角度来说，由于医疗服务价格远低于实际成本，医生的价值没有通过阳光收入得到合理体现，医疗服务行业难以吸引优秀人才的加入，加之缺乏规范统一的医生临床培训体系，导致合格的医生比例较低，医疗服务的供给远远无法满足需求。

### （二）公立医院的垄断和逐利进一步恶化医患矛盾

现有的医疗服务主要由公立医院提供，“看病贵”源于公立医院的市場力量和逐利性。由于政府补贴仅占公立医院收入的10%，逐利成为公立医院的必然选择，过低的医疗服务价格和药物加成的价格体系导致“以药养医”和过度医疗。病人在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人情成本后还需要花费高额医药费，以及承担过度用药的恶果，必然导致医患矛盾。

### （三）医疗服务的特殊性

医疗服务具有三个特殊性：第一，医生有病人不具有的专业知识（非对称信息）；第二，医疗服务涉及健康与生命；第三，医疗服务的结果有不确定性。医生具有病人没有的专业知识，为过度医疗提供了可能。医疗服务结果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医疗服务的需求方和供给方发生矛盾的可能性。

## 二、为何新医改以来医患关系并没有改善？

2009年开始的新医改着重于以下几方面的改革：扩大农村和城市的医保覆盖比率、提高医疗保障程度、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医保、实施基层医疗机构收支两条线、推广基本药品制度在基层医疗机构的实施和倡导公立医院“公益性”等等。所取得的成绩主要体现在需求侧：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全民医保，提高了医疗服务利用率。但是供给侧的改革基本不成功，也没有触及价格机制失灵的问题，因此无助于缓解医患矛盾，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激化了医患矛盾。

首先，由于不同等级医院没有价格差异化，医疗保障体系完善而增加的医疗服务需求基本都涌向了三甲医院。第二，基药制度导致基层医疗机

## 导读 >>

近年来，医患纠纷成为公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为何在大力推进医改、医保覆盖比例和保障力度都有显著提高的背景下，医患矛盾却愈演愈烈？当前医患矛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新医改为何加剧了医患矛盾和医疗服务的供需矛盾？在当前的大环境下，走怎样的医改路径才能解决医患矛盾？政府应该在医疗改革中起什么作用？这些是本文将要解答的问题。

构不能再提供一些常用处方药，而收支两条线又降低了基层医疗服务人员的积极性，更多的病人分流向高等级医院。这两项改革都导致了高等级医院更严重的“看病难”和基层医疗资源的闲置。**第三**，在倡导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同时，对医院的财政支持却没有增加，医疗服务提供方的逐利动机没有改变，而随着医疗保障程度的提高，“看病贵”却更严重。**第四**，破除“以药养医”、公立医院改革和鼓励社会办医等供给侧改革几乎毫无进展，医疗服务供给的量和质都没有跟上需求的增加。这正是近些年医患矛盾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

### 三、未来改革路径设计：市场化道路为什么更适合当前的中国？

改革路径之一是继续走公立医院为主导的道路，但政府要给予公立医院足够的财政支持，让医院成为纯粹提供医疗服务而不是卖药卖检查的机构，让医生得到足够的阳光收入，吸引最优秀的人才进入这个行业。对于病人而言，按需获得医疗服务，而不是由价格调节。改革路径之二是医疗服务由市场来提供，医生成为自由人，市场机制决定其服务价值。在保证基础医疗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允许医疗服务质量和价格的差异化。

第一条道路更符合公平的原则，但是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在没有价格机制调节的情况下需要转诊制来提高医疗资源的有效分配。对于第二条改革路径主要的担忧有二：一是现有有限的优质医疗资源都会走向高端，中低收入群体会因此受损，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健康服务的需求似乎有违伦理；二是私立医院有很强的逐利动机，可能会损害病患福利。虽然两条医改道路各有利弊，但是我们认为第二条路径更适用于当前的中国，原因如下：

**第一，政府没有做好走第一条改革路径的准备。**2009年开始的新医改强调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但对医疗服务供给方的投入并没有明显增加，导致公立医院“公益性”停留于口号，“以药养医”的局面没有改善。

**第二，医生作为体制内的人，受到编制、职称评定、科研的束缚很难改变。**没有市场定价的制度里，医生收入一定会和职称、资历挂钩，导致医生无法专注于提高治病救人的专业能力和“病患第一”的服务意识。

**第三，政府要同时作为公立医院的经营者和医疗市场的管理者，难以公平监管。**“管办不分”是现有医疗制度的一个顽疾，管理部门很难对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一视同仁，当公立医院出现问题时，管理部门往往抱着能掩盖则掩盖的态度，导致的结果是公立医院有恃无恐，而老百姓对管理部门也无法信任。

**第四，对私人部门提供医疗服务的担忧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解决。**虽然民营医院是逐利的，但是市场机制的魅力恰恰在于，当有足够的竞争者时，每一个人都会努力地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更好的服务来吸引病人，利己的同时也会利他。私立医院过去几年有很多负面新闻，恰恰是因为管理部门重事前审核、轻事后监管造成的。给医疗市场设置行政准入门槛，往往导致寻租和竞争不充分的问题，进入医疗行业的未必就是效率高、服务

质量合格的机构。而事后没有政府监管、市场竞争又不充分的情况下，医院当然有动机让病人多消费高消费。同时私立医院口碑差也和他们无法吸引到优秀的医生有关，优秀的医生是医疗市场竞争力的核心，当医生挣脱了编制的束缚成为自由执业者，私立医院的医疗服务质量将得到更好的保障。

**第五，医疗服务的本质并不意味着政府来提供医疗服务更有利于社会福利。**医疗服务本身不具有公共品的特征，公立医院的现状也足以说明，公立医院未必就“公益”，在扭曲的价格体系和垄断优质医疗资源的情况下，公立医院同样会过度医疗、损害病患福利。关于不同所有制形式医院的差异已有很多国外文献做过相关研究，并没有发现公立医院在运营效率、服务质量和价格上有优势。医疗服务由谁来提供，应该是看谁提供的服务更好、价更低、效率更高，而这样的问题，显然市场能告诉我们答案。

#### 四、在医疗改革中政府应该做什么？

即便是市场化的医疗体系，政府在其中也要起到重要的作用。

**首先，应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体系。**政府要保证在老百姓在面临健康冲击时能病有所医。

**第二，应建立统一完善的医师培训制度。**医疗服务本身没有公共产品的特征，但是优秀的医生却是公共产品，如果医生实现自由执业，相互竞争的医院将没有动机去培养医生，政府应建立一套系统的临床培训体系，保证医疗服务质量。

**第三，提供基础医疗服务，为低收入群体的医疗需求托底。**市场化的一个担心是，优秀医疗资源在短时期内是有限的，差异化的医疗服务，会在托底的医生还不够合格的情况下，优秀医生都已经进入高端市场，中低收入群体的健康服务质量无法保障。这确实是市场化过程中一个很可能出现的问题。现在的医疗市场，因为价格失灵，病人是通过花大量时间排队、托关系欠人情债或者从黄牛那里高价买号的方式来获取紧缺的医疗资源，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特征。虽然医疗服务的市场化可能会带来短时期内低收入者的福利受损，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当医疗服务的价值通过市场得到了明确，才会有更多优秀的人才愿意当医生，当医疗市场中的供应者的素质得到普遍的提高，托底就不再是问题。但是好医生的增加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为了确保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政府应当在配合转诊制度的前提下保证部分高质量医疗服务以低价的形式提供给低收入群体，同时建立完善的医生临床培训体系，提高存量的医疗人员的总体水平，在基层医疗机构做好守门人。

**第四，做好监管和惩罚。**医疗服务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信息，这种信息的获取有着公共品的特征：越是得到分享，其价值便越高，但信息的生产却需要耗费巨大的成本，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市场缺乏生产和提供医药卫生质量信息的动力和能力。政府有责任去改善医疗中的非对称信息，实施必要的监管和惩罚。

# 深度开发人工智能 须政商双方合力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 刘嘉

## AlphaGo 战果不出意外 暗示生命进化新形式

凭借近两年的爆发式发展，人工智能确实已经拥有了在围棋上战胜人脑的优势。早在 2015 年 10 月，阿尔法围棋就以 5 比 0 完胜欧洲围棋冠军职业二段选手樊麾，那时其实已经暗示了人工智能实力不容小觑。这次 3 月的人机对战结果也不会令人惊异，即使今年不能战胜李世石，那么明年后年也一定能，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1 年这个尺度在文明智慧进化的进程上，就是当下。所以我们可以说，AlphaGo 的横空出世，是文明智慧进化的一个里程碑的事件。

就 AlphaGo 本身而言，它主要是基于一个被称为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的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模拟人类大脑工作方式的人工神经网络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提出，90 年代达到高峰。只是因为当时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与存储能力的局限，它并没有表现出很好的问题解决效力而被搁置。所以，在我看来，AlphaGo 或者其核心的深度学习，本身并没有质的变化，变化的只是计算机解决复杂问题的计算能力和存储容量的提升。一个值得注意的是，AlphaGo 展现的不仅仅是在围棋上的突破，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人工智能将在众多领域中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其中之一就便是自动驾驶，它的普及，将大大地提升物流的效率并降低成本，革命性地改变国家的工业结构和 GDP 构成。自动驾驶并不是遥不可及，在五年到十年之内，自动驾驶将成为交通运输的主要方式，而人类驾驶仅会像骑马一样，成为人类竞技或者休闲娱乐的一种方式。所以，AlphaGo 出现的意义，不是宣告人类在一个领域的失势，不是宣告人类尊严的死亡，而是宣告新的工业革命的开端。

然而，当人类欣喜于计算机将自身从简单重复工作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必须察觉自身优势空间的减少甚至预料到自身的消亡。随着互联化的发展、计算机性能的提高，人工智能将进一步发展，从而释放出大量的从事简单重复工作的劳动力。而这些释放出的劳动力，将会从事更多的创造性的工作，而人工智能，由于这些创造性的工作，其能力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一旦奇点（singularity）到来，人工智能整体上超越人类的智能，那么人类的未来，便如面临人类祖先的尼安特鲁人一样，只会慢慢消亡。人工智能开始取代人类智能的时间点（即奇点），并不是要不可及——激进的观点认为在 2050 年的时候，就会开始；我的非常保守估计，是会在 100 年内发生。换言之，我们这一代人也许就有机会见证这一个文明智慧进化的历史时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并不认为这种取代，是一种象电影《终结者》里描述的一个物种对另外一个物种的残酷灭绝；即人类智

## 导读 >>

人工智能 AlphaGo 的胜利，不仅宣告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开端，而且暗示着生命像新的形式进化。人类应该主动融入这一新的载体，实现知识经验的永久传承。政府和投资人应培养长远投资战略眼光，努力抓住新生经济增长点。

能与人工智能处于绝对的敌对关系。相反，从生命进化过程中，物种的消亡和取代是符合自然进化的现象：人类本身犹如恐龙一样，在这条长河中只是匆匆过客。若硅基生命更适合生存、更适合生命的进化，那么自然而然生命的连续体就会从碳基生命逐渐过渡到硅基生命。所以，人类并没有消亡，而是在另一种载体中，继续延续生命的进化，文明智慧的拓展。

### 人类勿反趋势阻碍 而应主动融入

在好莱坞的影片中，人工智能通常代表的是人类的终结者。正是基于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所以一些人试图通过预先设定来防止人工智能的失控。最著名的便是阿西莫夫其科幻小说《我是机器人》中所提的“机器人三原则”：第一条：机器人不得危害人类。此外，不可因为疏忽危险的存在而使人类受害；第二条：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但命令违反第一条内容时，则不在此限；第三条：在不违反第一条和第二条的情况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其实这种顾虑或者制约既是不可行的也是多余的。为什么说是不可行的呢？正如我们不知道人类究竟是如何在 400 万年的进化中，产生出自我意识的，我们也很难精细控制人工智能的进化步骤。这是因为进化通常是爆发性的，掌握人工智能的进化，远难于我们让氢弹爆炸产生的狂暴能力有序有控地释放出来。为什么说是多余的呢？因为从进化的角度上讲，进化的关键在文明的传承和拓展，而人类智能的载体却有着先天的不足。我们的载体，即肉体是脆弱的，因此任何器官的问题（如肝脏因肝癌的坏死）就会导致整个载体的消亡，而计算机仅仅需要简单地更换一下零配件而已。因为载体的脆弱，个体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智慧就会随着这个载体的消亡，而消亡；而后来者只能根据前人留下的只言片语重新学习，重复前人的道路，因此人类的知识经验不容易被保留和传承，不容易被分享和吸纳。所以，我们为何一定要拘泥于肉体的形式而不主动去拥抱新生的存在形式呢？与其去防备人工智能这个“终结者”，还不如我们自身主动将智慧、情感注入到机器之中，在新的载体里进化、永生。

### 发现新生经济增长点 长远战略眼光不可少

心理学与脑科学所研究的人脑正是人工智能最佳老师，因此，深入了解人类心理的本质、大脑的工作机制，将为人工智能的进化带来关键性的灵感。在另一方面，正如汽车为了超过人类的前进速度，并不是去模拟人类走路，而是发明了轮子。同样，人工智能也不一定要完全照搬人类心智的工作方式与规则。相反、人工智能可以依托自身独有的特征，如大数据存储、高速运算能力等来制定适合自己进化的路径，走出一条适应自身的智能进化的独特道路。

今年两会上所提出的要办的 100 件大事中，脑科学和类脑科学被排在了最前面，而这两部分，都与人工智能有密切的关系。然而相比西方发达

国家，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在突破和创新上也有所差距。我并不认为这个差距在于我们缺乏兴趣或者契机，而是在于我们缺乏像国外那样的强烈动机。如前面所说，Google 之所以开发 AlphaGo，不是为了在围棋领域大展拳脚，更要在金融交易、个体及国家危机行为预警与干预的重大商业或国家急需上抢占先机。这股强劲的商业驱动力很利于科研向应用转化，而我们眼下极缺乏这股动力。在我国的投资人中，“煤老板”型的资本是投资的主流。他们掌握了大量资本，但缺乏战略投资眼光，无法深刻认识到人类发展前沿的新生事物及其所蕴含的经济增长点，所以过多的资本流向了低端（如 O2O）和短视（如智能手机）的项目中。一些基于脑科学的真正高科技产业（如 AlphaGo 的母体 DeepMind）反而不会受到“煤老板”型资本的青睐。在我看来，投资人或者机构有必要提高自身科学文化素养，或雇佣专业人士帮助做出判断。在政府方面，也是同样。第一，政府应耐心听取社会中坚力量、时代前沿者的新理念、新思想用以不断更新自身。政府亦可从智库这个信息传递归纳者处多多接收这些思想理念，使政策制定者充分认识社会，紧握时代前进的脉搏。第二，鼓励创新创业，扶持真正的高科技新产业。第三，也是最重要，即培养和激发人民的创造力、批判性思维等综合心理素质。目前的教育体系、选拔体系极大地忽视了超常教育，难以产生各个行业的领军人物。因此，基于现代理念的超常教育，势在必行。

# 应打破对机器人的消极偏见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徐英瑾

## 在开放性的问题上机器胜过人类才值得震惊

之前围棋界的一些人士信誓旦旦地说过人会赢，所以对于这个结果他们一定是不愿意看到的。我对这场比赛的结果事先没有做过预期，因为这其中涉及了很多的因素。但是我始终认为，即使这次人工智能赢不了，它下次也一定能赢。所以看到现在的结果，我也不会感到困扰。我赞成很多网友的观点，围棋有着其基本的游戏规则，就这种规则不变的封闭性问题而言，从原则上来说机器在任何一种这样的领域都迟早会碾压人类。但举个例子，双方从小开始踢足球，如果某一天双方都同意突然改变一下足球的规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是能继续踢下去的，而机器人则是来不及反应的。所以，机器人下棋赢了人类这样的事实不会让我感到震惊，对我来说，真正能让我震惊的是在那些开放性的问题上机器人能够和人类一较高下，比如文艺创作、写原创小说等。

## 人工智能研究需要有伦理学的维度

霍金曾在一些场合强调，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也许有一天它将强大到灭绝人类。实际上，我对霍金的话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我们要把伦理的东西放进这些问题里。即使我认为霍金的话是危言耸听，但我仍认为要主张人工智能的伦理研究，并且需要有伦理学的维度。霍金的描述中人工智能能够完全碾压、控制人类，这不只是指人工智能将会抢夺人类的工作岗位，而是指完全地控制人类、超越人类。我认为人工智能离这个目标非常远，正因如此，现在说这样的话有点为时过早，我们需要有更多具有说服力的成果让我们看一看未来机器人的能力。

我认为任何产品的指导都需要伦理的关怀，机器人自然也属于产品的一种，怎么能没有伦理的关怀？现有的信息技术已经对公民的隐私等问题构成了很大的影响，就比如大数据技术，它的影响几乎和人工智能可以等同，它必然会对公民的隐私构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如何在大数据的推进和维护公民隐私之间寻找平衡点，这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目前也在讨论机器编码工业安全性标准，研究怎么保证使机器对人类的危害保持在最小，我认为这样的考量是很重要的。这方面的考量并不是就人工智能本身发展到一定水平而言的，而是在还没达到那么高的水平前我们就要开始考量了。哲学讨论到伦理维度时，基本上要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工业事故对于人类的危害，并且在危害出现了以后，能够想办法找到危害源予以制止，并能够找到危害的责任者加以处理。就比如车坏了以后找到其责任人，到底是发动机的供应商有问题，还是驾驶员的问题，或是调度的问题。智能机器人

## 导读 >>

在开放性问题上机器人若胜过了人类才值得震惊，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入发展，需要纳入伦理学维度的研究，而人类在此过程中也应该摒弃对机器人的消极偏见。

在这里指出了一个问题。假设未来的技术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在此水平上的真正智能指的是：机器人具有自主性决策能力，而这种决策正好对人类构成了危害。在这样的情况下，该怎样猜度机器人的责任。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譬如，在机器人作出危害的情况下，将现有的法律应用于机器人身上，把一个机器人送上法庭，这似乎是很荒谬的。这个问题正好是哲学人需要综合处理的，这不完全是一个技术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流行（比如说谷歌）找哲学家来讨论机器哲学中的伦理问题。

### 应打破对机器人的消极偏见

关于人们总是担忧机器人有一天会毁灭人类，这是一个很类似于外星人的问题。人们总是认为如果外星人和我们来交流的话，这并不是什么好事，他们跨过那么远的距离，究其动机，我认为他们迟早是会把人类毁灭的。人们对机器人也持有这种偏见。我先假设前提成立，即机器人的智能水平已经能够达到甚至超越人类的水平，那么我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为什么要灭了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人类的智能也很高，我们人类的智能高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产生环保意识了，我们就知道不能消灭其他动物，一般知识水平更高的人更能理解环保的理念。为什么机器人不能产生和人类和平共处的想法呢？如果机器人也有宗教意识的话，为什么不会相信大乘佛教，对万物保持悲天悯人的态度呢？因此，我们大可不必总是对机器人持有消极的偏见。

# 人工智能大有可为 人类是最终掌控者

复旦大学机器人智能实验室主任 张文强

## 阿尔法狗战胜李世石 不足为奇

针对3月9日、3月10日阿尔法狗对弈李世石，且两盘皆胜。张文强老师认为这一结果不足为奇，实属正常。他举出1997年IBM的“深蓝”战胜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的例子，表示当年轰动全球的事件，回过头看只是是技术进步的一个结果。

## 中美人工智能研究有差距 产学研协作是关键 根源在体制

张老师认为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引领世界发展潮流，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两方面。第一，美国高校创新做得好，包括斯坦福、MIT等大学科研机构，给“谷歌狗”人工智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储备和理论算法方面的支持。第二，美国产业界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财力，支持人工智能的发展。张老师指出像谷歌、FACEBOOK这些大公司都有实验室，进行人工智能的研究，产业界和学术界紧密合作是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的关键因素。访谈中，张老师对中国产业界近些年来在互联网+、人工智能研究方面付出的努力表示了肯定，对于中国人工智能研究的前景持乐观的态度。

当然，张老师也指出我国与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存在差距，并直指问题根源，即创新的机制体制。他认为在如何评价创新的体系机制方面，我们需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学习。

同时，对于弥补这种差距，他从三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从国家层面来说，国家必须要重视互联网+、人工智能这块的布局。其次，学术界应当从创新体制方面入手，不断推出创新性的人才。有了创新性人才以后，做出创新性的成果就顺理成章了。最后，张老师建议产业界也要沉下心来，前期舍得投入资金支出前沿的研究工作。新兴的技术刚开始不可能一下子带来盈利或利润。他认为产学研结合起来好好研究的话，中国有机会追上美国人工智能的发展。

## 人工智能发展：硬件是基础 算法是核心

张老师针对人工智能近年来的迅速发展指出了两方面原因。从硬件层面，计算能力和计算资源突飞猛进。过去需要计算很长时间的算法，现在短时期就可以给出结果。在理论算法方面，他指出阿尔法狗的“深度学习”与以往偏浅层的神经网络有很大不同。阿尔法狗的取胜充分体现了超越人类的大数据样本学习和强化学习的有效性，背后是大规模棋类大师的棋谱数据作为支撑，体现了人类群体的智慧和才能。就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来说，张老师认为还是需要推动硬件和算法方面的进步。要使硬件设施能在

## 导读 >>

AlphaGo 战胜人类棋手，技术进步的一个结果。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存在差距，中国要想超越美国，要加强产学研协作和体制创新。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依然有赖于硬件和算法方面的提高。在这一进程中，机器若想取代人脑依然很难，人类是最终掌控者。

低成本的基础上处理非常复杂的算法；要让智能性不断提升。张老师甚至假设说，未来的机器会不会有情感，便是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 **电脑代替人脑？很难很难**

张老师认为电脑很难很难替代人脑。他以多年的研究经验告诉我们：学者越深入了解人工智能，就越知道人工智能存在诸多缺陷。现在全世界的人工智能都还处于一个非常低级的阶段。即使是最顶级的人工智能设备——阿尔法狗，它也只是在某些方面——以规则为基础的计算和搜索能力领域，超过了人脑。张老师更深刻地指出，机器智能的开发者目前都不清楚大脑是如何思考、思维的，就更不可能使机器具备人脑思索、思维的方式。

### **人工智能有科学伦理 人类是最终掌控者**

张老师告诉我们在做机器人的研究开发时，存在一套机器人的伦理性纲领，去约束机器人不能作恶犯罪。但他同时认为不能因为机器人研究有这种风险，就不做研究了。他开玩笑说最简单的终止机器人的方法，就是拔掉电源。他最后总结说，对于人工智能，我们不能悲观，但也不要刻意拔高，主动权最终还是在人类手上。

# 中俄正处深化和发展合作的关键时期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冯绍雷

不管是从国内转型还是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来说，中俄双边关系都处于重要的转折点。

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和俄罗斯在各自的国内都经历过三个相似阶段的制度变迁。20世纪80年代，中俄两国兴起了以市场和民主为起点的第一阶段改革。两国主要是模仿西方的制度来实行现代化和制度化的改革。在这个阶段，两国在制度改革中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并同时建立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21世纪的前十年是中俄两国改革的第二阶段，在有利的全球经济大环境中，两国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势如破竹，尤其是国有经济得到空前的飞速发展，国家的自治权和主观性增强，同时国际影响力也在大幅度地提升。平心而论，两国正面临着第三阶段的改革。

在新型国际与国内政治、经济和安全背景下，两国都正准备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从本质来说是对过去的延续。这个阶段既不同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情况，也区别于21世纪的前十年，而是两国在维持稳定的基础上确保国家在各自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强劲的引导作用，发挥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管理中的作用，提高民主决策的水平。在俄罗斯，根据“政治经济危机”的逻辑呼吁改革；在中国，由习近平和李克强领导下的政府除了明确规划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倡通过简政放权和发挥市场在确保政治稳定中的调控作用来促进创新和发展。无论哪种改革开始时都不易，但两者的内在逻辑和面临挑战最终都会到达现在这个阶段。事实上，中国和俄罗斯在国内变迁过程中的相似性也为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和深入提供了必备的前提条件。

从目前的外部国际环境来看，冷战结束之后的国际政治发展步入新时期。在这段时期，尽管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原来由美国主导的西方不再像原来一样唯美马首是瞻。多极化的权力格局和多元的思想文化，使得源源不断的概念和思想很难被抑制。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挑战是他们在短期内仍然不能替代西方的经济发展潜力。但毫无疑问，这些经济体反映了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趋势；20国集团和全球金融危机衍生的一系列国际机构都是这种变化趋势的表现；全球化的进程被阻碍而地区性的政治和经济竞争变成了新的焦点，这也是当前国际方面共同努力调整的一种表现形式。简而言之，冷战结束之后的25年里，由西方主导相对稳定的环境现状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一个崭新的过渡形式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同时伴随着各种不安定和不确定前景。

对中俄关系来说，外部的环境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关键在于，两国不应该只关注当前形势，而是通过总结，深化和发展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 导读 >>

中国和俄罗斯都处于形势复杂的欧亚地缘政治环境中，绝非处于美国所谓的“安全地带”。

来把握好方向。与此同时，两国还应该在创新和完善发展方面紧跟时代的潮流。

从政治角度来说，可以从深厚的历史渊源来解释中俄关系并非“权宜之计”。中国和俄罗斯都有其各自漫长的文明和变迁历史。我们都体会到了相似的、通往现代化道路上的艰辛，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政治发展的观念和想法。也不得不面对充满无秩序竞争和复杂多样利益模式的外部环境，这种环境过度由意识形态主导，甚至有点像“寻租”或“魔鬼化”。因此两国很自然就建立合作，对彼此情况互相理解和支持。

然而，考虑到中俄合作未来的定位，从何种程度上来说我们有关于两国在未来国际体系中政治定位的成熟思考？我们应该去试图实现对现有国际秩序的“革命变革”或“改革”吗？这些问题应该被明确地回答。深入地考虑这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发现不仅是西方势力在对中国和俄罗斯施加压力，而且全球和地区水平上的权力结构也是分化的，甚至一些地方已失去控制，陷入无政府状态。因此，两国的选择必定影响到整个局势。

从经济视角来看，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转型期国家，作为邻国有天然和便利的地理优势来实现经济上的互补。两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弗拉基米尔·普京关于开展联系欧亚经济体“一带一路”倡议的“协作”方案，已成为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决定，促进两国在新形势下的双边经济合作。目前，这个基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框架与中国和欧亚经济体咨询交流的“协作”过程，也通过中国-蒙古-俄罗斯的三边合作来实现。进一步可以预见到，中俄经济合作将会有更广阔的基础和发展空间。

根据国际政治经济的原理，国际经济成功主要取决于政治上的合作，特别是强国之间的合作。因此，促进中俄双边经济关系合作的关键不在于合作的必要性而是促进合作的方式。为此，双方都需要在认知上理性地聚焦一些关键问题。

首先，对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都拥有广袤土地和经历艰难变迁的国家来说，建立合作机制是非常困难的，总体来看比一些小的市场经济体要更加艰难。对中俄经济合作来说，形成不同于传统的思路 and 想法非常必要。例如，在本世纪初，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被提出，但是到现在为止，只是被当做一个议程，足以见其困难程度。不管这是意味着自由贸易协定不适合中国和俄罗斯，还是我们仍然需要考虑更多的意见，或是我们应该结合自由贸易协定通过一些新措施来促进经济合作，这些都是需要被回答的问题。

第二，我曾经听到一位研究中俄经济和贸易很多年的专家提到一些完全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中俄之间任何的有效合作在离开了政府的推动和促进之后都很难实现，而有人想法正好相反，他们认为只有私人企业才能让合作真正实现。中俄合作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让政府还是企业来推动合作，特别是怎样定义每一个私营企业的功能边界，以及如何有效

地将其与合作需求进行匹配。

第三，当我们成功地实现了进步，开始新一轮的合作，仍然不能忽视中俄经济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尽管过去存在着很多的合作计划，但往往都被搁置许久，最终成果寥寥。究竟是提议本身存在问题，还是缺少有效的安全机制或标准呢？

从安全的角度考虑，至少有以下方面值得深思：中俄合作的重要基础是什么，以及需要进一步澄清和妥善解决的有哪些。

中国和俄罗斯都处于形势复杂的欧亚地缘政治环境中，绝非处于美国所谓的“安全地带”。客观情境使得中俄诉诸于外部机制和环境，可以减轻和抵消各种外部压力对国内的影响。就此而言，两国如何在没有继承传统“势力范围”措施的情况下照顾到对方的感受？有些西方著名学者强调了背景，这在理论和国际法律领域都成为一个问题。我们尤其需要在实际情况中仔细观察和谨慎辨别。

第二，当谈到区域合作机制时，近年发生的一系列区域危机证明亚太地区并不能简单地复制其他地区安全机制的经验。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已经设立了区域性和次区域性合作的模式。中国和俄罗斯怎样在区域性和次区域性合作安全机制中进一步加深合作呢？譬如，我们怎样进一步定义上海合作组织的区域角色？怎样同时协调好安全和经济的功能？上海合作组织怎样扩大和提升其实力，包括怎样吸引年轻的一代，怎样去提高他们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关注和参与度？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后，对中国 - 俄罗斯 - 美国的三边关系来说，似乎并不存在使三者共存或促成直接合作的平台，尽管三者实际上并没有间断其长期互动。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多边关系集团。从世界历史演变来看，在基本框架下的三边关系从未低于任何一个双边关系。中俄关系对处理三边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原则，比如，没有战争、没有对抗、没有针对任何第三方。如何确认这种三边关系的建立不会重现冷战时期的悲剧呢？这可能是当今时代国际政治中最具争议的问题。

综上所述，乐观来讲，不管中俄两国是否有可能进入国内转型的第三阶段，还是冷战之后的国际格局将进入第二阶段，事实上都为促进中 - 俄 - 美三边关系互动提供了机遇。甚至是席卷全球的恐怖主义也会促进三边关系的合作。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未来也可能存在一些不希望出现的情况。

关键在美国没有出现像在中国和俄罗斯国内的重大改变，也没有出现像在中俄两国国内的理论反思。换句话说，当美国意识形态不可能在实际发生改变时，该国政治家和精英应该首先明确中 - 俄 - 美三边关系的未来前景。

翻译 / 金彤  
校对 / 夏梦

# “一带一路”中极端宗教主义渗透风险及其对策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宗教学研究室主任，上海高校智库中心访问学者 邱文平

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要打破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围堵，开拓通往欧洲的经济大动脉；同时也要以经济发展带动边疆地区快速进入现代文明体系，实现维护新疆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战略目标。没有新疆的稳定和谐，“一带一路”的战略发展会始终处于根基不稳的状态；经济的发展和、宗教的交流应该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目标的。所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要考虑防范极端宗教主义借“一带一路”对我国穆斯林的渗透。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和瓦哈比教派最初都是为了反抗西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而兴起的，但同时它们也是极端排外和不宽容的。其派生的ISIS等伊斯兰极端宗教组织在中亚地区日益猖獗，已经对我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如何与同为第三世界的伊斯兰国家构建共同发展经济、消弭极端宗教主义的现实路径，同时阻止名目繁多的极端宗教主义对我国穆斯林的侵蚀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中之重。

## 一、沙特的瓦哈比教派和土耳其泛突厥主义的宗教渗透需要警惕。

伊斯兰教极端宗教主义的产生有着重要的思想根源，分别存在于逊尼派与什叶派之中。逊尼派穆斯林因其教派地域广大，人口众多，极端组织数目也更多。因中国的穆斯林90%属于逊尼派，其对中国的影响和危害也更为严重。沙特国王阿卜杜拉曾经公布法律：任何形式的无神论思想、任何质疑伊斯兰宗教的行为，都将被视为“恐怖主义”[2014年4月3日《环球时报》引自《纽约每日新闻》]。虽然这种偏执的法规只是沙特国内的立法，但其实质反映了沙特的瓦哈比教派对其它宗教，尤其对无神论者的强力排斥和歧视，这种本质上的不宽容特色，在其传播过程中必然带来对其他民族，尤其是不信教民族的极度仇视。瓦哈比教派对我国的影响相当深远，因为其对我国穆斯林地区的传播和渗透源远流长，近年在国内穆斯林的推动下又有急剧扩张的倾向

土耳其不断在我国民族问题上挑衅，干涉我国内政，在破坏我国边疆稳定、民族和谐上比美国更具现实的威胁。近期内土耳其已经处于中东政治动乱中自顾不暇，我国如不能在其危机四伏的时候迫使其放弃突厥帝国梦想，当其恢复元气后，必然变本加厉和中国较量。“一带一路”不仅是个经济工程，更重要的是要一个解决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构筑抵御宗教极端主义狂潮阵地的政治工程。对土耳其外交和宣传上不作为状态只能变相的鼓励了偷渡者和三股势力的嚣张气焰，对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成文化的威胁。

## 导读 >>

如何与同为第三世界的伊斯兰国家构建共同发展经济、消弭极端宗教主义的现实路径，同时阻止名目繁多的极端宗教主义对我国穆斯林的侵蚀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中之重。

## 二、新疆泛滥的宗教热潮下的“有寺无教”现象。

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是全世界面临的暴恐根源，新疆屡次发生的暴力事件都打着宗教的旗号。所以大多数人对新疆的宗教氛围会有误解，认为新疆的宗教气氛非常浓厚。实际上，虽然新疆有世界上密度最高的清真寺，但是绝大多数阿訇只是中小学毕业，很多只限于会诵读阿拉伯文《古兰经》，对经文都一知半解，经训教义更是语焉不详，很难辨别出哪些是正统的教义信仰，哪些是极端宗教主义。原因在于南疆群众普遍教育水平太低，离开现代文明太远，也没有途径可以了解和开拓自己的视野，对于宗教信仰只能处于蒙昧状态，这就导致极端宗教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份子很容易就能找到市场和生存空间，以简单粗暴的传销方式进行“宗教洗脑”。

囿于历史上中央和新疆对于宗教问题认识的摇摆不定，宗教政策上严控和放任交替进行，对于核心问题的阿訇培养缺乏系统规划和尊重，导致基层阿訇在心理上抵触宗教管理，在教义上无法抵制宗教极端份子的入侵。如莎车县共有1700座清真寺，每年只有2个去乌鲁木齐经学院的培训名额，大批的阿訇和“塔力甫”（宗教学生）穷于应付政治学习，没有机会学习宗教知识。其结果就是阿訇在清真寺讲政治，地下讲经班占据了宗教的阐释权，蛊惑人心，煽动暴恐。

## 三、“一带一路”中各族群众利益均沾的问题。

群众的利益得到保障，才能收拢人心共同发展，边疆的长治久安才能得到保证。新疆穆斯林民族数量居全国之冠，然而以北疆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为代表的众多穆斯林几乎不参与暴恐活动，也证明信仰伊斯兰教并非暴恐的根源。维吾尔族的特殊性有其历史的渊源和现实的生存压力。南疆维吾尔族人口据统计已经超过900万，而实际上肯定超过1000万。南疆沙漠戈壁占据了多数地域，适于人居的绿洲不过几块，如果政府不能在人口控制和人均收入上都有所作为，南疆的乱局必然是长期存在的。

对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对外交流，政府一直面临暴恐管控与文化交流的难题，这也是从新疆到云南连绵不断偷渡事件的根源。管控虽然是维护当前社会稳定的正确思路，可是如果从“一带一路”的宏观视野来看，中国和中亚、西亚及中东的经济交往、文化交流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新疆各个穆斯林民族对此都具有天然的宗教、种族和语言优势，他们也渴望着能够在这波经济大潮中改善自己的生存处境，丝绸之路建设同样也急需这些人才和渠道。如何组织少数民族群众，培养穆斯林青年走向现代化文明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在维护稳定与长治久安之间，我们需要更多的创新思维。

有鉴于此，对上述问题我们有以下的思索与建议。

### 1、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考虑防范极端宗教主义借“一带一路”大举进入中国。

中国作为超级大国崛起已经是国际公认的情况下，极右的基督教宪政

和极左的伊斯兰极端宗教主义都对我国加强了传教力度，其意图都是想影响我国的内政外交。我国现有 2000 余万穆斯林，ISIS 等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宗教入侵已经对我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一路一带”规划中如何与同为第三世界的伊斯兰国家构建共同发展经济、消弭极端宗教主义的现实路径，同时阻止名目繁多的极端宗教主义对我国穆斯林的侵蚀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中之重。

2、对阿訇和“塔力甫”的培养要提到政治高度来看。伊斯兰经学院需要扩大招生及培训范围，除了讲政治，对他们进行系统的宗教培训是当务之急。同时要加大和东南亚、西亚比较温和的伊斯兰教国家的宗教交流，共同协商如何恢复伊斯兰教“中道”和“绿色”本质的教义。新疆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只能依靠基层的阿訇和接班人“塔力甫”，只有他们能够影响到广大的穆斯林群众，他们的人心向背是核心的问题。

3、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可以批量引进中亚、西亚和中东国家世俗化影音产品加以翻译推广；大力支持贴近新疆生活的维语电视，电影的制作，尤其要注意培养精通维汉两种语言的制片人和导演。纵观新疆的各个维语频道，有深度贴近普通群众生活的节目稀少，好的电影、电视剧更是寥寥无几，没有高质量、大批量的宣传手段，宗教的去极端化和对现代文明的接受都无从谈起。

4、边疆的双语教育应该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度的。对于边疆长远发展而言，精通双语的各族学生不仅是建设边疆的根本，也是开拓“一带一路”的迫切需求。如果在边疆所有学校开设民族语言课程，不仅照顾了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感情，增加了大批精通双语的各族人才，同时也能够解决大批持少数民族语言大学生的就业难题。新疆的双语教育遭到维吾尔族消极对待，除了极端份子的宣传，学无所用也是重要的原因。考虑到新疆的实际情况，可以在高考语言类增加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用以补充、替换外语语种，增加各民族互相学习对方语言的动力。

5、中阿大学合作不能仅仅限于回族地区的高校，上海等高校资源密集地区同样需要参与其中。我们需要将新疆穆斯林学生纳入考虑范围，不能因噎废食。2015 年 9 月 12 日“第三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大学校长论坛”在银川举行。中阿多国高校联合发表《中阿高等学校战略性合作行动计划》，计划提出，4 年内将不断扩大中阿高校间学生的联合培养规模。从“一带一路”的宏观视野来看，中国和中亚、西亚及中东的经济交往、文化交流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丝绸之路建设同样也急需新疆少数民族人才和渠道。新疆穆斯林大学生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如果不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生存及政治上升空间，回疆工作后宗教逆反心理恐会更为严重，此点已经为事实所验证。

# 打造“国共论坛”2.0版本

复旦发展研究院科研助理，台湾政治大学 段哲哲

国民党前秘书长李四川去职前，将1月败选以来走遍21县市的心得，汇整成“党务革新报告”提交洪秀柱，为了扭转所谓“亲中”形象，还建议取消国共论坛，改以具体协商两岸议题的交流为主；虽然在引发党内外比较大的争议，但是这种提议及转变值得我们关注，及时调整相关政策，应对台湾社会气氛转变；我们初步认为国共论坛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需要调整方向与内容，升级为国共论坛2.0版。

## 一、“国共论坛”的历史脉络（1.0版的国共论坛）。

“国共论坛”在创立之初提供了两岸接触的平台，也取得了比较多的成果。二〇〇五年当时国民党主席连战与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历史性会面后，达成“五项共同愿景”，其中之一为建立国共平台。2006年四月在中国北京召开第一届国共论坛，双方以“共同建议”方式，触及经贸、直航、农业等领域交流合作的政策建议。广告扁朝期间，国共论坛每届都提出一连串「政策建议」；二〇〇八年马英九政府上台，连战受马英九压力，被迫释出国共论坛主导权；二〇一二年马英九连任后，中国开始在论坛上大谈「政治议题」，催促政治谈判。二〇一四年第十届论坛暂停举办，延至去年五月由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率团参加，论坛主题未受外界关注，国共论坛的实际效果、内容及形式都两岸双方都开始需要调整。

## 二、“国共论坛”有存在的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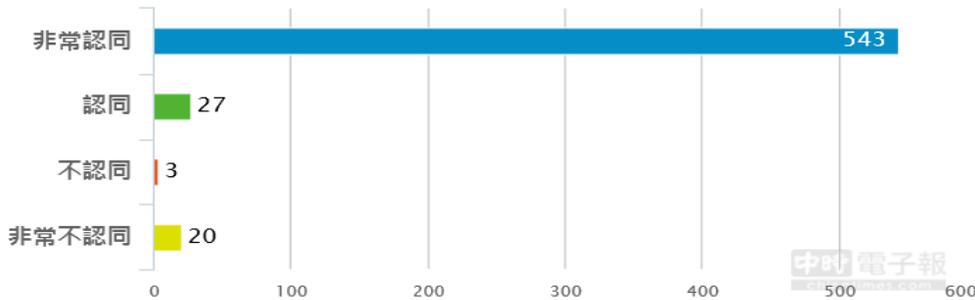
“国共论坛”在成立之初就是为了搭建两岸沟通平台，而今蔡英文即将上台，而民进党新政府很有可能不会将“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两岸架构清楚说明，两岸都需要国共论坛以政党对政党的形式沟通；这样的观点也得到陈学圣的认可，他认为“520后民进党政府与大陆关系还不知道如何发展，若两岸恶化，国共论坛将会有助于两岸发展”蔡正元甚至认为“国民党若不要「国共论坛」，民进党可急着要「民共论坛」，就跟「服贸」和「两岸监督条例」一样，国民党搞服贸，民进党就骂亲中，等国民党下台，民进党急着要服贸；国民党搞两岸监督条例，民进党全力阻挡，等国民党下台，民进党急着自动生效”，在中时电子报在2016年4月4日-2016年4月5日之间的网上民调显示，9成赞同不废除国共论坛，还是主张两岸交流的（具体见图一）；在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喊出的转型，再加上前副主席郝龙斌主张不能废除，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林德福也说，国共论坛规模可以缩小，但一定要延续办理，国民党内除了秘书长李四川，几乎都是赞成维持国共论坛的声音。因此，新任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说在今天终于公

## 导读 >>

国共论坛是两岸沟通的平台，在两岸沟通平台建设上应该关注台湾社会的变化，升为2.0版的常态化、解决问题式平台。

开表示，“国共论坛有存在的必要性，至于方向可以调整。”，因此“公共论坛”这个平台有存在的必要，符合台湾社会主流民意的期待。

图表 1 中时电子报对蔡正元观点“做民进党鸚鵡没前途，不建议废除国共论坛”的网上投票结果（2016 年 4 月 4 日 -4 月 5 日）



### 三、“国共论坛”需要升级为 2.0，应该更加务实。

国共论坛是两岸沟通的平台，其实质是为台湾争取利益，但是在台湾社会让国民党有倾向印象，从而挑动了台湾社会民众敏感的神经，而近年由于马政府上台，两岸沟通平台众多，“国共论坛”沦为“大拜拜”，才有了国民党内目前的取消的声音。因此未来，我们在两岸沟通平台建设上应该关注台湾社会的变化，升为 2.0 版的常态化、解决问题式平台，调整方向：第一，对具体议题做一些调整，重视的是青年、基层的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释放红利让台湾社会民众共享，进一步加深台湾社会对中国大陆经济的依赖。其次，缩小论坛规模，关注民间议题。未来国民党已经变成在野党，可以就一些民间的意见彼此交流，是一个论坛的方式，不是像过去这样子的大规模的。第三，每年一次的“国共论坛”只是一个论坛，针对国民党提出的“台商服务中心”其实是为了建立常态机制与机构，更好服务在中国大陆台商，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将“国共论坛”的形式与一些常态机制配合，更好沟通问题，解决问题。



# 《中国观》2016年长期征稿启事

为更好地落实新型智库建设，推动科学研究与决策咨询的相互转化，提供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的咨询报告与专家建议，复旦发展研究院和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拟就《中国观》向国内外学者长期征稿。《中国观》以中国当下各领域的热点议题为关注重点，每月上月刊以“国际视角 前沿观点”为主题，选编国外顶尖智库最新中国研究成果，每月下月刊以“中国智库 建言发展”为主题，收录国内智库专家对当前中国热点问题的政策分析。

## 一、征稿要求

1、政策分析或建议，对前瞻性、综合性问题有深度思考，选题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内政、外交、经济、社会、教育等与中国发展密切相关的领域。

2、英文版：可推荐国外智库或主流媒体发表的英文稿件（如为其他种类语言，请附上200字左右文章概述），亦可投送本人英文研究成果，经编辑部确定用稿后，由荐稿单位或个人组织翻译，或由编辑部统一翻译。

3、中文版：（1）各单位或个人可向编辑部投送稿件，选题自拟，语言精练、平实，避免学术化，字数3000字左右，文末附100字以内的作者简介；（2）如稿件涉及重大敏感问题，请勿用电子邮件直接发送，将文稿刻录光盘同纸质文本一并寄送至编辑部。

## 二、投稿须知

1、投稿邮箱为：[centrems@fudan.edu.cn](mailto:centrems@fudan.edu.cn)，投稿时邮件主题处填写稿件标题，在文末附上以下内容（个人信息十分重要，要求准确无误）：文章标题、作者姓名、荐稿人姓名（或单位名称）、邮寄联系方式、电子邮件、电话号码。

2、一次一稿，请勿一次多稿或重复投稿。

3、允许稿件向其他刊物或渠道投送，录用意见一月内给出。一旦录用，编辑部会给予适当奖励。

##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昊，夏梦

联系电话：021-5566 5501

电子邮件：[centrems@fudan.edu.cn](mailto:centrems@fudan.edu.cn)

寄送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光华楼东辅楼703室

邮编：200433



## 复旦发展研究院

复旦发展研究院成立于1993年2月12日，对外立足于一流智库的建设，为国家和上海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复旦的思想与智慧，成为国家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对内立足于学科的交叉与整合，研究团队的建设与发展，以国家需求推动学科整合，以学科整合贡献国家发展，提升复旦大学在国家建设与进步中的地位与影响。复旦发展研究院所孵化和培育的研究机构包括7个国内中心，即：金融研究中心、金砖国家研究中心、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传播与国家治理中心、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社会科学数据研究中心、中国保险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3个海外中心，包括：复旦-UC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复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复旦-墨西哥中心（墨西哥蒙特雷技术大学）；1个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家俱乐部，2个大型论坛秘书处，分别为中国大学智库论坛秘书处与上海论坛组委会秘书处。



##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在上海市教委领导下，依托复旦大学，致力于培育和提升上海高校智库建设的能力和水平，构建国内有地位、国际有影响的上海高校智库体系，以服务出管理、以内部交流出整合、以国际对话出影响、以评估出质量、以贡献出地位，搭建立足上海、服务全国和放眼世界的交流平台、推介平台和国际对话平台。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聚合上海高校的学术和智库资源，转化智库研究成果，为国家和政府建言献策；通过媒体向大众推介智库思想，实现学术成果的社会价值；培育有咨政能力的复合型优秀学者，推动高校学科建设，促进新型特色高校智库发展。

中国的角度

世界的维度

专业的深度

战略的高度

一般性声明：

\* 本刊仅供本刊编辑部呈送的特定对象阅读使用，不做任何商业用途。

\* 除明确提示的文章外，本刊其他文章基于已公开信息编译或选摘，但本刊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

\* 本刊所编译、选摘的文章，仅如实、客观反映原作者观点和立场，并不代表本刊编辑部的观点和立场。

\* 本刊属于内部资料，本刊编辑部对其保留一切权利。除非本刊编辑部事先书面授权，本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成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或复制品，或分发给特定阅读对象以外的人。

General Statement:

\* This publication is provided by the editorial team for use by specially designated persons only. It is not for sale or redistribution.

\* Unless otherwise noted, this publication's content is compiled, translated and edited from public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It does not guarantee the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of said materials.

\* Views expressed in the articles here are the original authors' own and do not represent the views of the editorial team.

\* Material on these pages is for internal reference only. The editorial team reserves all rights. No portion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copied, altered in any way or transmitted to others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editorial team.